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漢代「頌」體文、賦之意義考論—以東漢前期為核心 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計畫類別：個別型
計畫編號：NSC 95-2411-H-002-069-
執行期間：95年08月01日至96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暨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吳旻旻

計畫參與人員：大學生-兼任助理：張佩瑜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96 年 11 月 21 日

國科會專題計畫 結案報告

計畫名稱：漢代「頌」體文、賦之意義考論—以東漢前期為核心

主持人：吳旻旻

計畫編號：NSC 95-2411-H-002-069

執行期間：2006/08/01 ~ 2007/07/31

一、前言

主持人長期從事楚辭、漢賦相關研究，發表過《香草美人文學傳統》（臺北：里仁書局，2006年）、〈漢中葉賦家對《楚辭》喻託手法的詮釋與應用〉（《先秦兩漢學術》學報第五期，2006.03，頁127-149）、〈「框架、節奏、神化」：析論漢代散體賦之美感與意義〉（《臺大中文學報》第二十五期，2006.12，頁53-93）等專書或論文；並主持國科會計畫：「文學覺醒的百年之路——東漢中後期創作活動與文學意識演變之考察」（NSC-93-2411-H-002-068，2004/08/01 ~ 2005/07/31）及「漢賦的美學與文化意義——由賦的鋪陳視角談起」（NSC-94-2411-H-002-081，2005/08/01 ~ 2006/07/31）等，在研究過程中，發現東漢初期讚詠性質的賦、頌大量出現，通常而言，讀者對頌揚性質的作品印象不佳，尤其漢代賦家多為言語侍從，工作便是在皇帝面前以能文而邀寵，於是大家會認為頌揚之作應是賦家創作時針對特定讀者——皇帝——的需求而肆其聲貌，目的在「快主上之意，愜君王之心」。本人過去也抱持此種想法，但實際閱讀文本之後，驚覺這樣的認知可能有所偏頗，其實漢賦作家和歷代創作其他文體的文士一樣，都具有知識份子的理想性，試圖藉由書寫來彰顯他們對時代的關注省思，以及前瞻性的邦國遠景，故這些崇巨而務麗的散體大賦應當放在建構秩序的動機下來考察，即使短小的碑贊或刻石也涵攝歷史思維，值得更深入地探析；另一方面，東漢初期以崇尚氣節、士風醇美著稱，何以會大量出現頌體作品，這樣的現象如何解釋？這些作品意義何在？故提出本計畫試作探討。

二、研究目的

東漢前期帶有「頌詠」性質的賦、文、詩等作品大量出現，如班固〈兩都賦〉、〈典引〉、〈封燕然山銘〉、〈安豐戴侯（竇融）頌〉、〈車騎將軍竇北征頌〉、〈明堂詩〉、〈辟雍詩〉、〈靈臺詩〉、〈寶鼎詩〉、〈白雉詩〉，傅毅〈洛都賦〉、〈竇將軍北征頌〉、〈顯宗頌〉、〈西征頌〉，崔駰〈四巡頌〉（《後漢書》將〈東巡頌〉、〈南巡

頌〉、〈西巡頌〉、〈北巡頌〉等四篇合稱四巡頌，東平王劉蒼〈光武受命中興頌〉，馬融〈廣成頌〉、〈東巡頌〉、〈梁大將軍西第頌〉，史岑〈和熹鄧后頌〉、〈出師頌〉等等，這些作品密集地出現於東漢明、章時期，據史書描述，明、章兩朝共三十一年(57-88)，「天下安平，百姓殷富」，政府屢下詔招撫流民，賑濟鰥寡孤獨和貧民前後凡九次；修治汴渠完成，消除西漢平帝以來河汴決壞；設置西域都護和戊己校尉……等，政績斐然，「明章之治」似乎具有值得頌揚的文治武功，但是歷史何嘗如此簡化？這個時代才剛剛經歷王莽的篡變，而王莽事件背後又是漢代學術發展裡極其關鍵的今古文之爭，為什麼東漢承認了王莽始立的古文經博士？這和大量的「巡狩」頌體有無關連？而且頌揚的對象不止君王，還包含后妃外戚貴臣，究竟頌體作品所體現的時代意義是什麼？

換言之，漢賦雖是文學作品，但是頌揚作品的大量出現，已經不是單純的文學問題，涉及政治環境、經學禮制、緯學災祥、意識形態等複雜層面，本計畫透過對東漢初期整體環境的全盤了解，試圖掌握漢頌背後光影交錯的歷史圖像，讓一種被忽視已久的賦體以較真確的面貌重現。

三、文獻探討

學界對於漢代頌體賦直接研究的論文數量不多，其中康達維〈漢頌——論班固《東都賦》和同時代的京都賦〉、蔣文燕〈漢頌：漢代頌揚主題的另一種表現——兼談漢頌與漢賦的關係〉與王德華〈東漢前期賦頌二體的互滲與散體大賦的走向〉較為重要。

美國漢學教授康達維〈漢頌——論班固《東都賦》和同時代的京都賦〉一文認為《文選》將〈兩都賦〉列為首篇，體例仿《周禮·天官》，賦最關心的就是王朝和帝國，因此京都賦比遊歷賦重要一些，京都不僅是漢帝國的縮影，同時是宇宙的象徵。而班固以狂熱激情描繪東漢光武的功績、明帝的道德優越感，尤其強調三雍，體現了班固及其他重禮儀的儒者認為這些建築是東漢無可比擬的成就。蔣文燕〈漢頌：漢代頌揚主題的另一種表現——兼談漢頌與漢賦的關係〉(《南都學壇》(人文社會科學學報)第23卷第2期2003.1)彙整許多，從以賦為名及以頌為名的作品比較談起，凸顯漢代二者的交融，並認為漢頌受到《詩經》的影響。王德華〈東漢前期賦頌二體的互滲與散體大賦的走向〉(《文學遺產》2004年第四期)注意到「巡狩」題材的興起，引用《文館詞林》及《白虎通》等資料，認為東漢初年的作家有意識地宣揚漢德。

此外，早期的重要文獻如余英時〈東漢政權之建立與世族大姓之關係〉（收錄於氏著《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台北：聯經，民國 82 年初版二刷，頁 109-203），文中對於王莽興亡與士族大姓的關係、光武政權如何得到南陽大姓的擁戴，逐漸整合各方勢力進行翔實的考證與闡述，為後來的研究提供紮實的基礎。

晚近著作如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進史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年），第八至十章分別析論西漢、新莽、東漢的政治形態以及知識份子的角色，對於儒、法二家的迭伏有精彩的見解，然若剖析之際論證能更豐富嚴謹當更具說服力。王煥然《漢代士風與賦風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年，中國社會科學博士論文文庫）中也有一章談及東漢初期的士風與賦風，但是他所認知的東漢士風受顧炎武影響，側重凸顯理想美質，對於士人內在的掙扎思辯甚少措意。曹勝高《漢賦與漢代制度——以都城、校獵、禮儀為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第一章則是考證漢代都城制度，並探討遷都背後的馬、竇之爭，提供一些過去較少學者注意的實用史料。

整體而言，兩漢雖非顯學，但過去幾十年來在學者持續耕耘之下，兩千年的模糊面貌逐步清晰，譬如愈來愈多的學者同意西漢末年到東漢初年這段時間可能產生學術文化的重大轉折，兩漢其實是不同的面目，因此對這個轉折之際進行更深入的研究乃是刻不容緩的學術工作。

四、研究方法

本計畫欲探究兩漢經學昌盛的背景下，頌體作品的創作動機與時代意涵。在研究方法上，首先是針對西漢末期至東漢中期以頌為名及具頌揚性質的賦體——包括揚雄〈劇秦美新〉、班固〈兩都賦〉及〈典引〉、崔駰「四巡頌」及〈大將軍西征賦〉、馬融〈廣成頌〉、傅毅〈顯宗頌〉等作品——進行文本分析，並檢索史書、子書以查考相關背景，探究頌美文辭背後的政治意圖或言外深意。另一方面，為真正掌握漢儒對於「頌、美」的觀念，我們將廣泛查考《毛詩》、《鄭箋》、《史記》、《漢書》、《後漢書》、《潛夫論》、《論衡》、《白虎通》……等漢代經、史、子文獻，以確實理解他們對於「美／刺」、「頌／諷」的看法。換言之，本計畫一則把「頌」體放在時代脈絡下考察，參酌兩漢經學與政治發展，將歷史因素納入論述；二則借鑒於經學與文學的激盪，揭示賦家的特殊處境與作品的多元內涵。

五、結果與討論

經過數個月的資料研讀，主持人將本計畫研究焦點集中於三個問題：一是賦與頌的文體糾葛，二是新莽政權的意義，三是士風的變化。這些研究成果之詳細論證，主持人將撰寫成單篇論文發表於學術期刊上，以下僅簡略敘說。

就文體而言，學者一致公認漢頌受到《詩經》影響，因此，主持人以為這些作品應當放在國家集體意識的脈絡下解讀，而非查驗其中個人抒情言志的發揮，如《東巡頌》開篇稱頌「伊漢中興三葉，於皇惟烈，允由厥倫，纘三命，胤洪勛」，即使作者並未供職朝廷或接近權力核心，倘若據此便認為他是為搏名利而曲意奉承，似有誣古人之嫌。比較值得注意的是馬融〈廣成頌〉以及所謂「雜行出及頌德賦」，〈廣成頌〉的詮釋有頌揚及嘲諷兩說，另外《漢書·藝文志》把「雜賦」分為十二家，其中包含《雜行出及頌德賦》二十四篇，這些作品也兼有頌揚及諧謔色彩，因此漢代的「頌」並不像六朝文體論興盛之後界定得那般嚴謹狹隘。

至於第二個問題，王莽篡漢不僅是一個政治事件，同時涉及學術方向以及意識形態的修正，首先，西漢後期國室漸衰之後，漢德將被取而代之的說法就傳佈於上下階層，王莽又以權貴子弟而能好學謙讓的形象備受好評，因此他並非以蠻力強奪政權，而是在士大夫的擁護之下和平取得政權，大力推行復古新政，卻又在短短數年之間證實新政並不可行，於是東漢在王莽之後，落入一個尷尬的情境：秦朝至西漢的法家和王莽的儒家都證明不可行，東漢政權面臨一個治國方向的重大難題。同時，兩漢之際經歷十餘年的紛擾，各方勢力相繼打著復漢旗幟角逐鹿鼎，最後勝出而成立東漢政權的光武帝劉秀與原來的西漢政治勢力並未有太緊密的銜續關係，因此他捨西都長安而定都東京洛陽，新起的東漢世族與舊有關中世族形成一種微妙的緊張與抗衡。在複雜的勢力糾葛以及尋求政權合理基礎之下，如何面對西漢和新莽這兩個前政權，成為東漢初年知識份子不易坦率直言的命題。實際上，要徹底擺脫秦漢的法家統治方式，或是王莽時期效周公的儒家美政理想，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因此東漢初期出現士大夫爭相頌揚的現象，本計畫認為這乃是士人用頌來作為治國路線的論辯與捍衛，以班固〈兩都賦〉為例，背後是遷都爭議，遷都背後是更深層的是否要依循前朝制度規章乃是治國方式的爭議，只是班固以頌揚東都的方式含蓄表達。此外，東漢初年頌揚的內容頗多集中於巡狩以及明堂、辟雍等，恐怕也耐人尋味，王莽時就設明堂、辟雍，明章之世此道更盛，除了古文學派的漸受重視，禮學在此際興盛與新的國家意識型態的建立亦當併而觀之。

第三個層面，戰國至西漢，縱橫游士滔滔不絕的雄辯姿態形成一種特殊的士風，其中固然有誇大、強辯、功利等缺點，但是鮮明的個體意識以及幽默感卻也令人印象深刻；然而這種風格在東漢並不受推崇，東漢試圖建立新的士風典範。這背後亦有複雜的時代因素，首先，帝國日趨穩定的官僚體系不利游士發揮，外在環境的變遷迫使士人必須調整心態。其次，王莽極其迷信讖緯之學，在下者不斷奏以祥瑞之徵，實際上卻是國祚極短；東漢成立之後，光武、明、章批判王莽時期群臣阿諛成風，反對臣子針對祥瑞徵兆獻文頌揚，但災異讖緯在當時仍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臣子揣摩上意，於是朝廷不斷地發生有人獻瑞，而皇帝婉拒的戲碼，君臣之間形成新的互動方式。其三、光武以獎勵氣節為名提拔隱逸之士，實則是對於之前阿附王莽、槐囂、公孫述等不同勢力者的俱斥或儆示，但提拔隱逸之士此一舉措卻使得原本與「仕」對立的「隱」的概念成為進入仕途的方式之一，知識份子的背離朝廷竟然成為趨近仕宦的道路，種種新的因素衝擊士人心理，於是戰國游士堅持自我主張，合則來、不合則去的主動姿態不復可見，「臣」的字義逐漸凌駕「士」之上。當然，我們不能悲觀地說此後中國知識份子都妥協於政權，東漢末年的黨錮之禍便是極端的抗爭，只是在平日的君臣互動中，個人政治主張的表達不再如戰國西漢那般直接，而有了種種曲折方式，頌亦是其中之一。

六、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之成果主要為即將發表的單篇學術論文，此一研究的價值簡單說來可包含以下數點：

1. 釐清頌體發展歷程之輪廓，辨別漢代頌體作品之題材、手法特質或衍化流變關係，成為頌贊文體相關研究之重要基礎。
2. 辨析「頌、賦」之間的關係，彰顯辭賦之中頌美作品的文學意義與時代精神。
3. 接合漢代文學與漢代思想、經學之研究，有助於「漢代文化」整體研究之提升。
4. 深入漢代知識份子之創作意圖，突顯文學除了美學意義之外，文士如何以自身所擅長的才能善盡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兼與今日社會亂象相參照。